

· 书评 ·

变革的悖论与艰难的解困之路

——《俄罗斯之路 30 年：国家变革与制度选择》一书的启示与思考^{*}

李 燕 张亚娜

苏联解体后，有关苏联解体的原因一直是国内外政论界、学术界、各种媒体的热议话题，人们先后提出几十种说法，试图解开这一“20 世纪之谜”，但始终众说纷纭，难有定论。为此，由苏联—俄罗斯研究专家张树华研究员著、中信出版集团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俄罗斯之路 30 年：国家变革与制度选择》于 2018 年 7 月出版发行。该书从“思想自由化”、“经济私有化”、“政治民主化”三个维度入手，解析苏联—俄罗斯的变革历程及其政治、经济、社会后果，勾勒了苏联—俄罗斯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至今 30 余年改革之路，为解答“20 世纪之谜”提供了全新视角。

一、意识形态斗争从未停止，不可放松警惕

在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国家间，意识形态斗争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关乎国家发展道路和命运。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所谓的改革，对苏联的生死存亡产生了重大影响。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民主化”、“公开性”、“舆论多元化”等政治改革主张，大肆否定社会主义苏联历史，否定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其政治主张和改革实践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放弃了共产主义信仰，导致舆论阵地完全失守，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泛滥，广大党员群众无所适从。书中从共产主义理想的丧失、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思想的转变、放弃意识形态阵地等方面分析了苏共的背叛行为，书中指出：“正是以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人背弃共产主义信仰，在思想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在理论上推行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在社会发展上期望西方经济援助，最终导致‘改革’误入歧途，瓦解了国家，搞垮了苏联共产党，也葬送了苏联社会主义事业。”^①

^{*} 本文系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当代俄罗斯宗教发展与社会转型研究”（HB15ZZ008）；燕山大学 2015 年度青年教师自主研究计划课题社科类 A 类资助项目“当代俄罗斯的宗教与社会关系的发展研究”（15SKA007）的阶段性成果。

^① 张树华著《俄罗斯之路 30 年——国家变革与制度选择》，中信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6 页。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面临体制混乱和发展困境。尽管叶利钦执政不到十年，但他的激进改革加重了社会生活的无序和混乱。普京执政时期，为重聚民心，提出了凝聚社会的“俄罗斯新思想”，包括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观念和社会团结等内容。普京认为，爱国主义是俄罗斯国家统一的基础，应努力构建当代俄罗斯的爱国主义价值观。他主张重评苏联历史，并推动重新编写历史教科书。进入新世纪后，俄罗斯多次举行胜利日阅兵纪念活动，以期凝聚国民意志，唤醒民族精神。在普京的第二个总统任期，俄罗斯又提出“主权民主论”，力图重建有别于西方的俄罗斯价值体系。

还在苏联解体之初，以福山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就提出“意识形态终结论”，但从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社会意识和价值体系重建过程中可以看到，无论国家间的角力还是一国价值体系的重构，意识形态作用都不可忽视，反映了国家间的政治博弈，是国家间竞争的必占之地乃至决胜之地。

二、西方私有化搞垮了苏联经济也掏空了俄罗斯家底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应根据本国具体情况，有目标、有方向、有秩序地进行。但是，无论是戈尔巴乔夫的“社会主义改革”还是叶利钦的资本主义改革，都是以西方为模板，不遗余力地套用西方私有化发展模式。事实证明，用“西方的工具”解决社会主义苏联以及刚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俄罗斯的社会问题，其结果适得其反。

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雷日科夫等曾提议采取渐进措施，逐步推行市场经济，但被否决。戈尔巴乔夫集团主张完全摧毁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大规模私有化，并实施沙塔林方案，争取从1990年11月1日到1992年3月14日的500天内，分四个阶段使苏联从计划经济迅速过渡到市场经济。这份由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谋士和美国情报部门共同参与制订的“500天计划”，以上千亿美元经济援助为诱饵，诱逼苏联采取激进市场化手段，目的是促使苏联全面放开市场，使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将苏联经济纳入西方自由市场模式的轨道。^①叶利钦继续这一“未竟事业”。他启用盖达尔、丘拜斯等“经济天才”，实施“休克疗法”，目标是“经济自由化，确立私有制”。书中对这个过程做了详尽分析。从中可看到，那些受西方模式影响的“经济天才”把私有化看作解决俄罗斯经济问题的“神药”，坚称“私有制”是最“符合人的天性的东西”，“私有制是万能的”。^②书中举出了俄罗斯私有化的种种乱象：“炮打白宫”、缺乏依据的立法、“外国军师和操盘手”大肆进入，“美国厨师制作俄罗斯私有化大餐”。^③结果导致俄罗斯经济信息大范围泄露，国有资产在“变卖”中大量流失，因拍卖不透明带来的混乱、腐败导致政府信誉严重下降；因管理机构不作为或消极作为，一些国有企业被强制“破产”，等等。既有政权危机、宪法危机等政治后果，更有经济发展大幅下降、民众生活水平严重降低、贫富分化、社会治安严

① 张树华著《俄罗斯之路30年——国家变革与制度选择》，中信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8页。

② 张树华著《俄罗斯之路30年——国家变革与制度选择》，中信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5、96页。

③ 张树华著《俄罗斯之路30年——国家变革与制度选择》，中信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0页。

重恶化、人口减少、人均寿命降低等恶果，“绝大多数群众受骗上当，受益的只是瓜分到社会财富的‘一小撮’”。^①从本质上看，俄罗斯私有化过程就是一个财富转移的过程，实质上是在平均分配的旗号下分光、卖光苏联七十年积累的社会财富。

书中还对来自民众与官方的各种评价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和分析。这是作者在其早期著作《私有化是祸？是福？——俄罗斯经济改革透视》基础上，利用最新材料进行的再梳理和再总结，也再一次证实，俄罗斯的私有化是失败的，其社会后果十分严重。有西方研究者指出，俄罗斯通过私有化在“摧毁了共产主义”的同时，也摧毁了自身经济的发展。俄罗斯通过私有化所建立的资本主义并非现代资本主义，而是粗陋的、混乱无序的资本主义。^②

该书还全面介绍了普京对私有化的认识和治理措施。普京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称为“混乱的15年”，他在演说中指出：“2.5%的巨富阶层控制着70%的俄罗斯资产……10%的最富阶层拥有全社会33.5%的财富。200位最富有的俄罗斯人掌握的财富总额高达12.5万亿卢布，这超过了俄罗斯联邦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私有化使得俄罗斯经济跌入崩溃边缘，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不及2%，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只占1%。“俄罗斯正处于数百年来最困难的一个历史时期，大概这是俄罗斯近200~300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抑或三流国家的危险。”^③正是基于这些认识，普京从上台之初就着手整顿国家经济。主要措施有：打击财阀寡头，查处了传媒大亨古辛斯基、“克里姆林宫教父”别列佐夫斯基、全国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将电视台、石油公司等收归国有，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掌控能力；国家积极扶助国企扩张，加强对战略性国企的监管，限制和规范中小企业私有化；通过能源企业重新国有化，用立法保证战略性国企的核心地位，等等。有西方舆论认为，俄罗斯在普京时期的私有化进入了一个“国家资本主义”阶段。言外之意，是俄罗斯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西方“人民资本主义”私有化完全不同。作者认为，“国家资本主义”说法不符合俄罗斯事实。^④

三、西式民主不能保障俄罗斯实现社会稳定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的秘密报告，缔造了一批“二十大的孩子”，在苏联政治中出现了“60年代人”，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就是这些“社会民主主义者”在高层的代表。在他们的鼓动与操作下，苏联的改革从头到尾充斥着“民主的、人道的”改造意味，“不仅要改变苏联的经济结构，还要修改苏联制度的思想基础，甚至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苏联的政治程

① 张树华著《俄罗斯之路30年——国家变革与制度选择》，中信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09页。

② (美)约瑟夫·R·布拉西、玛雅·克罗莫娃、道格拉斯·克鲁斯著，乔宇译《俄罗斯私有化调查》，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③ 张树华著《俄罗斯之路30年——国家变革与制度选择》，中信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56、157页。

④ 张树华著《俄罗斯之路30年——国家变革与制度选择》，中信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69页。

序”。^①在各方“民主力量”推动下，以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和1990年苏共二十八大为标志的激进政治改革，把西方式的自由选举、多党制、总统制完全引入苏联。对于这个过程，作者有清晰的认识“戈尔巴乔夫的过度‘民主化’没能提高官僚机构的效率，没能推进经济改革，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相反，社会形势却持续恶化，政局动荡不安，最终使经济陷入崩溃的境地，导致政权瓦解。”^②

叶利钦时代既没有汲取戈尔巴乔夫“过度民主”的教训，也没有对民主乱象及时整治，反而继续从西方移植民主制度，同时又以俄罗斯方式强化总统权力。作者认为“这种‘没有强总统的强总统制’怪胎与民主背道而驰，俄罗斯被弱化的国家权力既不能从制度上推进民主和治理，也不能在实践中解决国家所面临的各种问题”。^③这些情况导致“财团参与政治，寡头政治盛行；黑金政治，家族、帮派‘暗箱’操作；新闻媒体被财阀控制，恣意妄为；腐败蔓延，行政效率低下；政治动乱，政局不稳”。^④实践证明，西方号称“普世价值”的民主，不仅给苏联带来了国家解体的结局，还造成中央权威旁落、黑帮盛行、社会失序、贪腐横行等种种社会恶果。

在民主被透支、国家治理失败的情况下，普京上台。普京认为，苏联—俄罗斯在民主自由问题上犯了“幼稚病”，社会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民主中的多数原则、选举原则、公决原则等都要根据国情做具体的规定，否则一定会被滥用。这样，普京时期政治上的民主就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时期的民主划清了界限。

普京在2005年的一次讲话中对西方“普世民主”的滥用进行了揭露“14年前，俄罗斯已经做出了赞成民主的选择……民主原则和标准的贯彻不应该让国家解体或让人民受穷……在俄罗斯土地上实施并加强民主不应危及民主理念。它应当使国家更加安定团结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⑤他主张推进民主化应当符合俄罗斯现实、历史和文化传统，民主应当建立在一定经济条件之上，法治是民主的基础，推进民主不能以牺牲法治和稳定为代价，言论自由不能以大众传媒的混乱为表现形式。当西方国家借民主之名在某些“后苏联空间”国家推广“街头政治”，推动“颜色革命”时，俄罗斯政府及时出手，从立法和行政职能等方面严防“颜色革命”，遏制西方的民主输出。

总之，普京时代，俄罗斯在与西式民主斗争中，在抵御“颜色革命”中逐步建立起俄式民主，探索了一种符合俄罗斯传统和现实需求的政治形式。

四、“有俄罗斯特色”的发展道路艰难曲折

戈尔巴乔夫改革使国家解体了；叶利钦改革中“卖光”了社会主义苏联家底，造就了一批

① 张树华著《俄罗斯之路30年——国家变革与制度选择》，中信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69页。

② 张树华著《俄罗斯之路30年——国家变革与制度选择》，中信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14页。

③ 张树华著《俄罗斯之路30年——国家变革与制度选择》，中信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30页。

④ 张树华著《俄罗斯之路30年——国家变革与制度选择》，中信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14页。

⑤ 张树华著《俄罗斯之路30年——国家变革与制度选择》，中信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85页。

“寡头”；普京改革恢复秩序。戈尔巴乔夫改革并不是为了使人民生活变得更好；叶利钦的经济私有化更是对全民财产的一次掠夺，令国家解体后破败的经济雪上加霜；普京执政后以强国富民为目标，坚持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实现了政治稳定和经济复兴，人民生活水平好转。普京在俄罗斯民意调查中始终保持较高的支持率，也说明了人民对他的信任和支持。

俄罗斯在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转轨”后，发现完全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并不能行得通。眼下，俄罗斯正在探索一条“有俄罗斯特色的资本主义之路”，这条路布满荆棘，很难判断是否成功，也许，正如中国学者李慎明所判断的那样，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再次使俄罗斯走上民族振兴之路，但还需假以时日，毕竟，世界社会主义的复兴趋势不可遏制。^①

除了上述启示，此书还从以下两方面引发人们进行新的思考。

第一，如何看待苏联改革的悖论与苏联解体的教训。

苏联曾是世界社会主义的“样板”，其社会主义制度不仅自身实践几十年，还“推广”到东欧、亚洲、拉美等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面“旗帜”。这个制度有其弊端，包括政治体制、经济管理机制、思想文化的教条与僵化。正因如此，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最初目的是要打破僵化局面，但最终却走入自由化、私有化、民主化失控的悖论中。回顾30多年苏联—俄罗斯改革之路，从书中可看到一个又一个“悖论”。如今，苏联解体已经过去近30年，其经济政治和社会后果正在继续浮现。从结果找寻原因，尤其是一些负有历史责任的政治家的行为动因，可以更清晰地理顺当时一些现象背后的机理。就此意义说，这部著作开了苏联解体“三十年祭”之先，对于解答“20世纪之谜”是一个贡献。

第二，如何解读“叶利钦时代”。

一般来说，中国学界与苏联—俄罗斯问题有关的研究者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历史学家、政论家主要关注苏联历史和苏联解体原因；当代俄罗斯问题研究者主要关注“普京时代”。而叶利钦时代正是把苏联历史和“普京时代”联结起来的过渡时期。这个时代的叶利钦如何应对苏联解体时的混乱以及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又给后人留下了怎样的政治经济“遗产”，梳理这个问题对深入理解苏联解体原因，解析苏联解体后果十分必要，也是解读当今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基础。因此，这本书对研究叶利钦时代有较大贡献。

(李燕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史学博士；张亚娜系燕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

[责任编辑：台红]

^① 李慎明 《李慎明论金融危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35页。